



世界大历史
UNIVERSAL HISTORY

美国民族主义传统的起源与演进

——约翰·亚当斯、亚伯拉罕·林肯、林登·约翰逊

**The American Nationalis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merican Liberal Tradition:
John Adams, Abraham Lincoln, and Lyndon Johnson**

付宇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美国民族主义传统的起源与演进

——约翰·亚当斯、亚伯拉罕·林肯、林登·约翰逊

**The American Nationalis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merican Liberal Tradition:
John Adams, Abraham Lincoln, and Lyndon Johnson**

付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美国民族主义传统的起源与演进：约翰·亚当斯、
亚伯拉罕·林肯、林登·约翰逊/付宇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7-201-06388-1

I. ①美… II. ①付… III. ①民族主义 - 研究 - 美国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040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mcbs.com.cn>

电子信箱：tjmcbs@126.com

天津市方正汇智彩色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字数：260 千字

定 价：33.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框架	1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6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0
第一章 民族主义的美国特性:概念、方法与理论	29
第一节 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理论	30
第二节 特殊的美国国家性格与美国民族主义	35
一、美利坚民族主义的雏形——山巅之城与天定命运	36
二、自我圣化与美利坚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终结论	40
第三节 东方主义视角下的美利坚民族主义	42
第二章 约翰·亚当斯与美国早期的民族主义	47
第一节 殖民地时期北美各殖民地自治实践的发展	48
第二节 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与美国民族主义的肇始	55
第三节 自由主义新社会的创建者——约翰·亚当斯的基本思想风貌	62
第四节 约翰·亚当斯思想的基点:美国伟大的来源	68
第五节 山巅之城——指引世界前进的美利坚	74
第六节 联邦主义:实现美国梦的载体	77
第七节 孤立主义的缘起——约翰·亚当斯的外交哲学与实践	82
一、奠基:约翰·亚当斯在大革命时期的外交思想与活动	82
二、远离欧洲权势斗争:约翰·亚当斯与孤立主义的起源	87
第三章 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民族主义的新生	93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重新定义与美利坚民族主义的转变	95
第二节 林肯早期的思想与实践	99
第三节 战争岁月:为自由而拯救联邦	108
第四节 为维护联邦而战:内战期间林肯政府的对欧外交	118

第五节	美国宪政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统一与重塑	124
第六节	未竟之业:林肯之后美国南部的重建及其局限性	132
第四章	擎天的阿特拉斯:林登·约翰逊与美国在越南的干涉与战争	137
第一节	约翰逊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风貌:乐观主义、行动主义与美国 伟大主义	139
第二节	“伟大社会”计划与美国民族主义	144
第三节	林登·约翰逊政府的外交哲学与实践	151
第四节	美国在越南的干涉与美国民族主义	158
第五章	结语:自由主义的当代扩展与美利坚民族主义	178
第一节	美国民族主义传统的基本色调:从约翰·亚当斯、亚伯拉罕·林肯 到林登·约翰逊	178
第二节	世界普遍史是否可能——历史终结论与自由主义的当代扩展	184
第三节	新保守主义笼罩下的美利坚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理念	187
第四节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霸权的软权力支撑	191
参考文献	195
后 记	207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框架

倘若对美国的基本国家特性进行深入的分析,则会发现传统的民族主义理论未必能够完全适合于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达成以来,民族国家逐渐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普遍国家形式。按照民族国家一般的经典定义,其基本特征乃是其内部的民众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与共同的民族血缘。^①然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的国家,其基本性格与传统欧亚大陆的民族国家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并不存在共同的民族血缘与文化传统。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凝聚起如此众多且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

与传统霸权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考量往往在美国对外行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护持也被美国视为更重要的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一。澳大利亚学者菲利普·达比在比较了英国霸权与美国霸权的不同之处后指出,对宏大道德原则的坚持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中心和最持久的特征之一。由于深受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美国领导人的公开发言总是带有一种很特别的腔调。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向他的国民宣称:美利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理想主义民族。将近半个世纪后,林登·约翰逊总统宣布,今天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利益在于那些我们认为与我们对全人类道德责任密不可分的部分。如果不能理解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就不能理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越南所进行的干涉与战争,也不能理解美国社会在对华关系上的复杂心态。^②时殷弘教授在

^① 从13世纪中叶开始到15世纪下半叶,西欧地区的英法等国开始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大体上以共同的民族血缘与文化传统作为一个重要特征。只是到了更加晚近的时代,现代民族国家才开始出现一些更加复杂的形式。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 Phillip Darby, *Three Faces of Imperialism: 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Asia and Africa, 187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评述越南战争时指出,越南被美国政府当做一个试验场和政治橱窗,在越南进行干预和打赢战争被认为是挫败和遏阻一切中国模式的解放运动的关键。^① 20世纪以来,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美国曾反复将某一场地方性冲突赋予世界性的意义。大致而言,美利坚民族主义在凝视整个世界时,常常带有两个基本特性。首先是普适主义,即认为美国的基本社会模式适用于全世界;其次是例外主义,即认为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山巅之国,美国是指引整个世界前进的灯塔。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国家性格,美国往往更倾向于在意识形态的催动下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一位美国学者曾经写道,在里根政府时代,美国与“邪恶的”苏联作战;在克林顿时代,美国把“流氓国家”当成主要的敌人;而在小布什政权时代,“邪恶轴心”则成为最可憎恶的恶魔。^②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是美国社会得以整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形成美国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如前所述,美国并非一个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内部的种族宗教构成可谓五光十色,十分复杂。近几十年来,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本土的兴起,美国社会的多元性与异质性也大为增加。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民众对社会主流文化与价值标准的认同又不可谓不整齐划一。正如共同的历史传统与血缘联系成为一般民族国家之国家认同的基石,对自由主义的认同也成为建构美利坚民族认同最重要的基石之一。美国著名学者汉斯·库恩指出,美国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族名来凝聚国人的情感,它是历史上第一个把自己等同于一种理念和思想的民族。他认为美国这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整套关于社会基本模式的论说,正如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法西斯主义与欧洲旧大陆的集权主义一样。^③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然成为凝聚美国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成为美国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美国众多的特殊性正来源于其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的独特关系。正是对自由主义传统的护持与追求建构了美利坚民族主义。恰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相关的;由于美国人不是来源于同一种族、文化或宗教,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就成为美国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

本书将选取美国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来进行研究。这三个历史人物是约翰·亚当斯、亚伯拉罕·林肯与林登·约翰逊。首先是约翰·亚当斯总统。

①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与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② 可参见 Ahmad Faruqi, “The Apocalyptic Vision of the Neo-Conservative Ideologues”, *Counter Punch*, November 26, 2002.

③ 分别见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ive Essay*, New York: Macmillan, 1957, pp. 3, 8-9; Lipe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p. 31.

之所以选取其作为研究的对象,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尽管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建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但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其与早期美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缺少必要的关注。此外,以往的研究对其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的复杂关系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是常常将其完全等同于通常的联邦党人,忽视了其思想的复杂性。第二,约翰·亚当斯的个人经历与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风貌。这不仅与其个人复杂独特的经历有关,也与其能够超越党派利益的行为风格有关。他的许多言行并非出于狭隘的一党之私,而是大多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客观判断,这就使得其成为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第三,选取约翰·亚当斯作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案例,不仅由于其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也是因为其与欧洲国家的深刻渊源。约翰·亚当斯实际上是美国早期对欧外交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佐尔坦·哈拉斯蒂(Zoltan Haraszti)指出,亚当斯也许是那一个时期对欧洲事务涉入最深的美国人之一。他待在欧洲的时间几乎超过被认为是对欧洲有深刻见解的杰弗逊总统的两倍;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及其所留下的大量历史资料使得我们可以对其在这一方面的思想进行比较深刻细致的考察。^①

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中的一员,约翰·亚当斯的孤立主义外交理念备受关注。他对欧洲旧大陆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美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如美国学者爱德华·汉德勒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最初来源于欧洲,然而欧洲却被视为腐败专制的象征。美国作为在新大陆建立起来的人类第一个现代共和国,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欧洲大陆进行了自我区隔,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美利坚民族主义传统。^② 约翰·温斯洛普在1630年以新教教谕的形式提出,美国应该建立一个道德社会,以成为一个昭示教化旧世界的山巅之城。^③ 由于这一时期美国在对外事务中所接触的主要对象是欧洲国家,“山巅之城”的概念就成为早期美国人区隔自己与欧洲旧大陆、建立美利坚民族主义的一项重要概念。1776年,在其颇具影响力的《常识》一书中,托马斯·潘恩借用和发展了这一观点。他指出:“美国的革命将提供一个建立更好的全新社会的契机:在我们的能力之内,我们可以重新创造世界。自从诺亚以来,直到如今,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势。新世界的生日即将到来。”^④从华盛顿到杰弗逊,几乎所有的美国开国元勋都受到这种思

① 可参见 Zoltan Haraszti, *John Adams and Prophets of Progress*,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② Handler Edward,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Ada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③ 参见 John Winthrop, *The History of New England from 1630 to 1649*, Salem, N. H.: Ayer Co., 1992。

④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http://www.constitution.org/tp/comsense.htm>。

想的影响,约翰·亚当斯自然也不例外。而正是出于这一思想,约翰·亚当斯等建国之父们建构了最初的美利坚民族主义。

翻开约翰·亚当斯早期的论著,对于美国特性的论述成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他看来,北美的先民们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民主实践,而这一独特性足以使北美人民与英国的专制统治实现彻底的分离。正是在此意义之上,早在哈佛上学的时代,约翰·亚当斯就公开宣传主张北美独立的思想。在他的笔下,北美先民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并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民主模式。而这种对美国独特性的论述就构成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早期基础。作为早期美国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亚当斯不仅是美国独立思想的早期提出者,也是美国联邦主义思想的重要阐述者。他主张为了对抗来自欧洲旧世界的污染与侵蚀,北美大陆应该成立共同的联邦,以维护北美人民最珍贵的自由主义原则和生活模式。在这里,美利坚民族主义第一次被自由主义认同建构起来,成为日后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重要力量。

其次是研究林肯总统。毫无疑问,林肯总统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现代美国的自我身份认定,基本完成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美国建构,奠定了今天美国内外政治的基础。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黑奴制在美国的地位成为影响美国内政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美国新并入的领土上是否实行黑奴制成为争论的焦点。围绕这一问题,美国的国内政治进行了重新组合。旧有的辉格党逐渐被挤出政坛,而共和党则成为美国政坛的一支新兴力量。林肯就是第一位当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

尽管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现实利益,然而有关黑奴废存的争论更多地是围绕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理念进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旧有的主要以白人和新教徒为中心的自由民权越来越向有色人种扩展,民主和人权越来越不被认为是基督徒和白种人的专利。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已不能容许黑奴制度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南北战争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奠定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的现代形态。尽管美国此时仍然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然而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变化,随着自由民权越来越被普适到所有的人,当然也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美国人的对外审视必将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

美国的内战时期恰恰是美国民族主义逐渐定型与固化的时期。自由主义理念、人权以及捍卫联邦的决心与努力交织在一起,成为重新建构美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这一民族主义不仅表现为对现世传统国家利益的追求,更表现为对彼岸意识形态乌托邦的执著。林肯总统在国家危难时期所阐释的一系列理念成为我们

深刻了解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民族主义关系的重要依据。正是对内战时期美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二位一体的论述,林肯总统重新阐发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实际上,林肯总统所论述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成为理解美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一环。

与林肯总统的时代不同,后世的美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在更广泛复杂的世界舞台上上演。而这也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以自由主义为底蕴的美国民族主义能否适应这个远为复杂的世界呢?而这也就构成了近世以来美国外交思想上现实主义与杰弗逊主义的争论,以及美国外交在此二者之间钟摆式的摆动。

最后是研究林登·约翰逊总统。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在越南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实际上反映了其在意识形态催动下所产生的民族主义狂热以及与此相伴的、改造世界的巨大冲动。在这里,越南战争被过度简化成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决,从而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复杂性视而不见。就像曾经存在过的霸权国家一样,美国也试图在世界扩展自己的势力;然而不同的是,这种扩张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走向自我圣化的意识形态,而非旧式的殖民扩张和宗教狂热。

林登·约翰逊总统是美国当代最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这不仅仅因为其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密切相关,也源于他特殊的性格特征和个人背景。林登·约翰逊出生于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没落贵族之家,从国会议员秘书的职位逐渐登上美国权力的顶峰。他29岁就成为联邦众议院议员,在此后的23年里历经了美国政治在20世纪的一系列重大转折,目睹了美国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后美国内部政治的巨大变迁,可以说是美国霸权在20世纪兴起的重要见证人之一。1963年,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的一片混乱中,他成为美国总统。在1964年的大选中,他又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美国总统。

林登·约翰逊当选总统的时刻正是冷战时期美国霸权在世界范围内日益达至顶峰的时刻,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是美国社会对光明前途的信心以及美利坚民族主义的伟大抱负。他所推行的“伟大社会”的自由主义社会改革使得他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一度声名鹊起。他敏锐地看到了国内的种族分歧、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整合起美国民众的国家认同。他对自由主义理想充满信心,并将这种理想上升为整个国家的目标,认为实践、推广自由主义理想就是美国最伟大的民族抱负。这种信念不仅仅将美国社会纳入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造模式之中,还延伸到了全世界,对南越政府的支持就成为检验这种信念的试金石。为了凝聚美国国内的政治支持,他操纵美国国内的政治议题,企图影响媒体的新闻报道。而这也使他在后来的国内政治生活中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

他迷信于美国的政治军事权势,将美国冷战时代的军事干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看成是检验美国信用的标准,并不惜为此在遥远的地区投入巨大的资源。他不顾自己西方盟友的反对,大大拓宽了美国对整个第三世界的军事干预。然而,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却让林登·约翰逊声名扫地,越南战争也成为美国现代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重挫之下,林登·约翰逊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宣布不再参加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1973年,在越南最终走向统一的时刻,他带着他的政治理想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只有65岁。直到此时,他仍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

林登·约翰逊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想代表了一种美国语境下审视世界的独特视角。在这里,美国的模式被放大到全世界,整个世界成为检验美国梦的试金石。在这种视界的审视之下,整个世界被简化为黑与白、专制与民主的对抗,在世界范围内维护、推广美国的基本生活方式就成为美利坚民族最难以割舍的民族抱负之一。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底蕴的美国民族主义,它不仅涉及美国的对外行为,而且关乎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运行方式。基辛格曾经指出:美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在对外行为中往往不把自身当做普通国家看待,而是自我想象成为引领世界的伟大国家。^①在美国建国初期,对于美国优越性的坚信导致了美国对外交往中的孤立主义倾向:在尽力不卷入欧洲旧世界的政治、军事权势斗争的同时,力图以美国自己的社会模式和行为模式去感召北美地区以外的人民。为此,华盛顿总统自嘲道:“美国所做的是为人类树立了高尚而新颖的榜样。”^②伴随国力的增长,在两百年后的今天,美国的干预和权势已近乎遍布全球,世界也被许多美国人当做了美国模式的实验场;“让世界美国化”——美国学者弗兰克·尼科维奇如此称呼这一审视外部世界的视角。^③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美国人总是自发地视本国的社会模式为人类取得进步的根本之途。文化学者萨义德对此批判道,美国社会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往往只是出于其自身的一相情愿,而非基于外部世界本身。^④要探究萨义德所言说的这一现象,就必须深入剖析以

①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页。

② 乔治·华盛顿:《华盛顿选集》,聂宗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2页。

③ Frank Ninkovich, *The Wilsonian Century: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p. 21 - 22.

④ 参见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自由主义传统为底蕴的美国民族主义。

1993年,在一片争论声中,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了著名比较政治学家塞繆尔·亨廷顿的论文《文明的冲突》。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教授写道,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中的冲突将主要来自于各个文明范式之间的冲突,过去那种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国际关系正在失去原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亨廷顿教授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范式划分为七个部分,也就是西方文明、斯拉夫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主要是中国)、拉丁美洲文明、印度教文明和日本文明;其中,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将会对西方世界构成最严重的挑战。文化学者萨义德指出,人类自古以来的各大宗教甚至各大思想体系,不但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是普适性的,而且也预设人性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意识和价值体系自然也不例外^①;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所展现的并非是对西方文明与价值体系的信心,而是对西方文明普适性的怀疑。这种怀疑与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自我想象大为不同,其中既包含了对美国霸权的忧虑,也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对以自由主义为底蕴的美国民族主义的反思,也就是说,在各种文明以及各种族群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作为美国民族主义合法性基础之一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不能成为整合世界乃至美国本身的普适性原则,从而对美国民族主义的认同基础提出了疑问。^②在处于新初的今天,有关于美国民族主义与基本国家认同的研究又一次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首先,本书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美国霸权和美国外交的理解。2001年,当美国世贸大楼因遭受恐怖分子攻击而在瞬间化为废墟的时刻,许多美国人感受到的恐惧、疑惑、不知所措和震惊,由此而来的巨大孤立感和愤懑情绪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说二战期间日本帝国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还可以被美国人归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天然的对外扩张性,那么美国人对“9·11”成因的反思则要复

^① 参见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② 在亨廷顿新近所出版的论著《我们是谁?》中,这种对于作为美国民族主义基础的身份认同的疑虑又一次明确地表现出来。在这里,亨廷顿似乎又回到了约翰·亚当斯在两百年前的观点;他认为,正是早期的定居者定义了今天美国的核心文化,而这种盎格鲁-萨克森文化正是美国自我身份认同的最主要来源,而它也就成为美国民族主义的基础。历史仿佛又拐了一个弯,亨廷顿对于美国特性的认同又回到了几百年前盎格鲁文化占据绝对优势的时代。亨廷顿对美国信条的坚信也大幅后退,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信条不足以提供当今美国人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建构的依据。这种思维的脉络大致复述了数年前他在《文明的冲突》中的基本脉络;所不同的只在于论文的演绎方式不同:一个是从美国国内向外推展,另一个则是从美国之外向美国国内推展。亨廷顿的这种观点与日裔美国人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历史终结论那里,自由主义不仅建构起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为整合世界的基本范式,而这也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主流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亨廷顿的观点注定将遭受更多的批评,尤其是来自于美国主流思想界的批评。相关内容可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杂和辛苦得多。美国,乃至普通美国人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攻击的目标,而他们受到攻击的原因仅仅在于他们是美国人,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美国式自由主义与生活方式。反美主义在一夜之间突然成为了整个世界的时髦话题,而美国人在震惊之余也不得不开始关注于这个对他们来说颇带感情色彩的话题。“他们为什么要恨我们”,这是当时许多美国人惯常发出的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日益纷繁复杂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促使了这些现象的出现?为什么美国的世界政策会导致如此激烈的反弹?要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的回答与阐释,就必须深入探究美国对外行为背后的动因,就必须更加深刻地理解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底蕴的美国民族主义。实际上,美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的结合对于美国的现实国家利益来说,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自由主义传统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结合增强了美国对外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有利于整合美国国内的共识,大大提升了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的软权力基础;然而,另一方面,两者结合也导致了美国对外行为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烈,引起了世界政治中其他行为体的反弹,妨害了美国霸权和美国国家利益。对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底蕴的美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于美国霸权的分析、评判和展望。

其次,从理论视角来看,加深对以自由主义为底蕴的美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探讨美国国家的基本特性,加深我们对美国文化的把握,特别是对美国社会中国家认同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理解。体现于《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中的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到底对美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嬗变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有着怎样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对美国的对外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对外行为又引起了外部世界怎样的反应?这些都是本书将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再次,本书的研究也将有利于对美国社会基本问题的理解。今天的美国社会又一次来到了大转折的路口;近三十年以来,伴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族裔人口的剧增,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截至2000年,美国人口中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是出生在国外。美国社会族群结构的巨大变化已经使族群问题日益成为美国国内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爆发的少数族裔暴动达到近百起。^①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前往美国的移民大多来自欧洲。这些移民尽管分属不同的民族,但由于欧洲民族之间在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具有同源性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早期的美国并没有出现对

^① 参见姬虹:“从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看美国人口状况”,《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73~77页。

多元文化主义的严肃思考。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所谓的“熔炉理论”,即无论美国社会中的各个族群源于何处,他们都应该认同美国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主流价值观,而这就成为建构美国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然而,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也随着新移民的大量涌入,这一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二战结束以后,前往美国的移民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拉美裔和亚裔成为新移民的主体,而由新移民所带来的文化、社会摩擦也大为增加。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兴起,也伴随着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力量日渐增强,文化多元主义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文化多元主义强调,美国是一个多元族裔的社会,不同族裔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历是不相同和不可通约的,美国文化不能以某一特定的历史经历和文化记忆为准绳来整合其他各个不同的族裔;文化多元主义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已经对美国社会中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形成了冲击。在此背景下,对于以自由主义为底蕴的美国民族主义的探究将会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美国社会中的族群问题。

最后,本书的研究亦将深化我们对美国历史的研究和理解。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在此一领域的研究和论述往往流于大致简单的概括,缺少精细、完整的理论与实证探讨。本书选取了美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总统作为研究的案例,以期刻画出一幅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在美国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建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历史画面。这三位总统是建国时期的约翰·亚当斯、南北战争时期的亚伯拉罕·林肯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林登·约翰逊。可以说,这三位总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以自由主义为底蕴的美利坚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深刻演进,也是美国由立国之初的孤立主义逐渐走向世界主义的重要参与者。本书对这三位总统个人生涯和政治哲学的深入论说将从一个较新的视角来把握美国内政外交的发展脉络。

正如历史学家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历史往往会在一一定的条件下重新上演,我们研究美国的历史,特别是研究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将会大有裨益于我们探讨美国今天的对外行为。不难发现,小布什政权在中东地区的政权更迭与国家重建,其外交理念及实际行为与林登·约翰逊政府有着诸多相似。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以自由主义为底蕴的美国民族主义往往在美国的对外行为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正因为如此,这种对于美国根本政治信条与民族主义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美国对外行为的判断,也将促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智识历史。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整体而言,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乏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然而另一方面,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同时对以自由主义为底蕴的美国民族主义进行系统探讨的论述并不多见。不过,这也为本书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应当指出,这里所探讨的自由主义传统并非国际关系理论上的自由主义流派,也并非美国两党论争中的自由主义取向,而是指关乎美国立国之本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这套信条体现于《美国宪法》与《独立宣言》之中,成为美国社会运行的基础。美国学者西蒙·利普塞特将其概括为五个部分,即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与放任主义。^① 本书所要探究的就是这一整套自由主义传统在构建美利坚基本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传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探讨自由主义传统是如何帮助将美国这个移民社会中众多不同的族群认同上升为国家的认同,上升为美利坚民族主义,并因而导致了美国民族主义怎样的特殊表现。大致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可评介如下。

一、关于美国文化、自由主义传统和民族主义的研究情况

国内外研究美国民族主义的著作很多,大体而言,对美国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的看法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种观点以西蒙·利普塞特与汉斯·库恩为代表,他们将美国看成是一个理念国家,认为与传统的民族国家不同,美国是通过一整套建立在自由主义政治原则之上的东西整合起来的,而这种对美利坚民族的建构尤其体现于《美国宪法》与《独立宣言》之中。相较而言,这一观点目前居于美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但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美国例外主义色彩,常常流于对美国民族主义的过度美化,而未看到美国民族主义的诸多负面效应。第二种观点则是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代表,即不承认美国是一个经典的民族国家,将美国视为一个由白人、黑人、拉美裔、亚裔和土著美国人所组成的微型联合国。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米歇尔·林德,其代表作为《新民族主义和第四次美国革命》。该观点实际上根本否定了美国国家基本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存在,因而不能很好地解释美国国家的一些内外行为,特别是美国在对外行为中所反复展现出来的典型的民族主义特征。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美国从来就是一个与任何民族国家没有不同的国家,不是政治意识形态,而是由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和共同的历史记忆所构成的普通民族国

^①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p. 31.

家。这种观点忽视了美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特征,也因而难以理解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移民国家的特殊之处。概言之,此三种观点各有短长,并相互竞争,已成为美国学术界的一大景观。^①

此外,近些年来学术界探讨美国外交思想与政策的著作也屡见不鲜,它们对于我们理解美国外交哲学与国家的基本特性也大有裨益。由于数量浩大、内容纷繁,此处仅以其中较为著名的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所著之《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为例。该书作者将美国的外交思想传统划分为汉密尔顿主义(注重商业利益与全球自由贸易的传统)、杰斐逊主义(高度珍视美国民主制度,对过多涉入外部事务持克制态度)、杰克逊主义(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传统,强调只有依靠军事力量才能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威尔逊主义(带有一种传教士的道义主义取向)。作者认为,这四个学派相互补充并直接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进。所缺憾的是,虽然该书引证了大量宽泛的历史事实,却没有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历史研究。此外,作者没有对各种思想传统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挖掘,而仅是在政策探讨层面上将某一决策者冠以杰克逊主义者等等的称号,有将美国外交思想传统过于简化的可能。整体而言,该书议论广泛,引证庞杂,既是它的一大优点,也有可能给它带来美中不足之处;不过,这也正是近年来此一领域著述的一大共同特点。^②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民族主义愈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文化研究的范式也日益显赫。然而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中真正能够将历史分析与理论阐述结合起来的著作并不多见。大致而言,美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后所造成的美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特征,是近几年来诸多学术著作的关注焦点之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利恩·阿纳托在2004年出版的《美利坚的对或错:对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剖析》一书。该书从两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既指出其基本内涵在于坚持和扩张美国信条,也指出对所谓美国信条的过于执著给美国对外行为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9·11”恐怖袭击;这本书也因此成为“9·11”事件后美国学术界反思美国文化与外交的重要著作之一。

^① 对于美国民族主义的讨论一直是美国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对于美国民族主义与国家特性研究的述评很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可参见 John O' Sullivan, "American Identity Crisis", in *National Review*, Vol. 46, issue 22, Nov 21, 1994。关于西蒙·利普塞特与汉斯·库恩的著作,可分别参见 Seymour M.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h Company, 1996; Hans Koha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ive Essay*. New York: Macmillan, 1957。关于米歇尔·林德的著作,可参见 Michael 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② 参见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然而该书的批评有时过于尖锐,阅读时应当有所保留。此外,福斯克·约翰所著的《领导自由世界:美国民族主义与冷战的文化根源》则对冷战时期美国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结合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阐述。该书对美国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冷战起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在这部书中,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国内关于冷战的共识会如此之快地形成,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深入到美国政治文化的底蕴当中,指出这种美国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与杜鲁门当局种种政策相结合最终导致了美国在冷战的泥潭之中越陷越深,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过度扩张以及世界的反弹。

另外一些著作则将关注的视角转向美国国内,具体探讨在美国这样一个多族群的国家,种类庞杂的族群认同是如何被凝聚、上升为美国民族主义的。雅各布森·马修·弗赖伊所著的《蛮荒的美德:当美国在国内外遭遇异服民族》,从美国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来探讨美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在这部书中,作者用历史学的方法具体描述了在1876年至1917年间,各个不同族群的美国人在国内外是如何与外国人共处,并由此导致了美国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的加强。作者非常细致地描写了当时美国人在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等地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一时期美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其基本风貌。斯科特·奇尔德雷斯与雷诺等人编著的《种族与现代美国民族主义的产物》一书则分析了美国国内种族问题对形成美国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的影响。作者用编年体的形式从美国内战一直写到当代,其中选取了日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等一系列案例,从实证的角度论述了美国国家认同形成的过程中美国国内种族因素的影响。梅林达在2002年出版的《爱国之火:在内战中的北方铸造新的美国民族主义》一书,则对美国内战时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建对美国民族主义的演变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剖析。这也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示、分析内战对于美国民族主义形成作用的著作,书中详细论证了内战时期联邦政府出于战时目的的一些措施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美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颇有裨益。沃尔德·斯特莱舍尔·大卫则在其所著《在永恒的圣宴之中:美国民族主义的构建1776—1820》一书中指出,民族主义并非一定基于先验的血缘与种族概念,而更多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该书特别强调美国民族主义与公共仪式之间的关系,强调公共仪式在超越美国国内族群认同、建构民族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并着重分析了18世纪末